

Zwischen Donar und Drachen

在雷神与巨龙之间

[德国] 卡尔-海因茨·嘉斯◎著

(Deutschland) Karl-Heinz Gass

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worum meine Gedanken Leib und Seele kreisen



在雷神与巨龙之间

Zwischen Donar und Drachen

——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worum meine Gedanken Leib und Seele kreisen

[德国] 卡尔-海因茨·嘉斯◎著

(Deutschland) Karl-Heinz Gass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雷神与巨龙之间：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 (德) 嘉斯 (Gass, K.H.) 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012-4362-4

I. ①在… II. ①嘉… III. ①嘉斯, K.H.—回忆录
IV. ①K835.16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6902号

图字：01-2012-6988号

责任编辑 龚玲琳 余岚
责任出版 赵 珩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甄树刚

书 名 在雷神与巨龙之间——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Zai Leishen Yu Julong Zhijian —— Wo Hunqian Mengrao de Guxiang

作 者 [德国] 卡尔-海因茨·嘉斯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97×1092毫米 1/16 10.5印张
字 数 225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62-4
定 价 120.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嘉斯先生新著《在雷神与巨龙之间》有感 (代序)

梅兆荣（中国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

卡尔-海因茨·嘉斯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真诚支持和帮助中国的一位国际友人。

嘉斯先生是德国莱法州多纳斯贝格县的一个手工业主——肉类加工技师。1981年7月他在瑞士伯尔尼高地度假期间，与正在那里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将军偶遇相识。两人虽然素昧平生，但嘉斯直言不讳的勇气引起了杨得志的注意和好感，而杨得志“慈父般”的友好邀请感动和激发了嘉斯了解和向往中国的强烈愿望。通过随后的一些交往，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陌生人奇迹般地建立起了相互理解和信任，成为持续13年之久的挚友，并为促进中德经济合作发挥了桥梁作用。

嘉斯同杨得志的友谊结出了丰硕成果：嘉斯以其职业知识为中国改善大众食品提出了十点建议，通过杨得志的推荐为中国主管部门所采纳并付诸实施。嘉斯在中国的良好人脉关系使他成为德国一些企业打开中国市场的开拓者，为推进两国企业合作做出了宝贵贡献。中德国情和文化的差异促使嘉斯认识到增进两国人民间相互了解的重要，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成立了“多纳斯贝格县德中友协”。针对德国一些媒体和政界人士在西藏问题上的偏见和无知，嘉斯凭借他多次访问西藏的所见所闻，撰文介绍西藏今昔以澄清事实真相，批驳错误观点。嘉斯对中国的真诚友谊和支持中国的行动，使他在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并被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

嘉斯不是一个专业作家。他以朴实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许多他亲历的真实故事。包括他与杨得志将军巧遇的经过和两人友谊的发展过程；他作为德国企业顾问在中国经历的艰



辛和乐趣；他为中德友谊作出的业绩和遭受的挫折。全书内容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他如何坚持不懈地为中德友谊和合作而奔波，即使在为德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时，他也不忘记：除了“生意”之外，还有不能用任何国家的货币所能表达出来的价值，即信任和人情。

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前会长）

在三十一年的那个夏天，德国一位普通的民间人士卡尔-海因茨·嘉斯先生在瑞士度假，与当时到瑞士访问的中国军队高级领导人杨得志将军不期而遇，他们因此结识成为朋友。由于这一次偶然的邂逅，嘉斯先生开始涉足于德中友好事业。

我二十多年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有幸与嘉斯先生结识。我知道他曾写过一本书《我的中国情》，回顾自己成为中国人民朋友的经历。他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经济不断发展提升的见证人，并且以自己的工作为中德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作出了贡献。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敌视的时候，他在家乡成立德中友好组织，更加积极地从事民间交流合作。他曾在西藏问题上发表文章，批驳对于中国的恶意攻击。他用三十年一贯的友好热情向世人证明了自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现在嘉斯先生已届72岁的高龄，他重温三十年来走过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路程，写下一本新书《在雷神与巨龙之间》，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挚爱之情。应该说这是他后半生从事德中友好事业的光荣总结。他写出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值得我们给予热情的赞美与感谢！

我们现在都认为国家的友好关系应该建立在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友谊的基础上。由于人民是一个数量很大的概念，在人民之间建立信任和友谊当然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嘉斯先生的经历正是这项艰巨工作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典范。嘉斯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德国人，他所交往的中国人中既有杨得志将军这样高级的领导人，也有我们对外友协的很多普通的民间友好人士。当我们的友谊发展起来之后，我们又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中国方面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给予的鼓励和推重。中国的民间友好事业的活力和影响力在嘉斯先生的经历中得到了证明。



我热烈祝贺并且欢迎嘉斯先生的新书出版，并衷心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为发展德中友好事业贡献力量。当然，我更希望两国青年中会有更多的人向嘉斯先生及友好事业前辈学习，在21世纪播下更多人民友谊的种子，书写更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陳昊輝

2012年8月30日

前 言

很早很早以前，智慧就已经给人们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凭借智慧，人们可以解读生活，并往往因此而使日子变得轻松一些。不管在什么时候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也不论渊源和传统有多么不同，经验和感受总会有相似之处。西方人认识到：“人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与此相对应，遥远的东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至理名言：“谁想活得快乐，就得学会改变自己。”这两句话分别出自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洛泰一世和中国古代哲人孔子，知道这一点对历史学家可能有意义，但对事情本身并无多大作用。生活永远是在变化，这便是我的人生经验。

作为一个家庭父亲和一个手工业主，作为一个业余乐师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莱茵普法尔茨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生活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中国，它和我究竟有什么干系？然而，如今这一切竟然都发生了，我把它看做是上天给我的一份独一无二的恩赐。这一切，都归因于在瑞士伯尔尼高地度假期间与一些再陌生不过的人的一次偶然相遇。1981年，在伯尔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将军的巧遇，成了后来整个故事的起点。而正因为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它也必然要导致独一无二的结果。

当时，人们可以感觉到，地球另一头的那个国家具有改革自己国家的强烈愿望。而来自远方的这个人也怀着对陌生国家人民及其思想的好奇心来到了这里。我那种不符合常规的风格以及我后来寄给他的一些建议，似乎很受他的喜欢。我们在后来的私人交往中，多次表现出相互的好奇和赞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的好奇和赞赏促使我们建立了独特的信赖关系。杨得志和我成了朋友。这种基于理解、信任和可靠性以及务实精神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下一代，这是给我的又一份馈赠。我后来和他的儿子杨建华将军及其家人也建立了充满信任的联系：一有机会，我就会经常去看望他和他的家人。



决定各国人民命运的，从来不是什么匿名的力量，而是具体的个人。是这些人的意志和信念修正了错误的发展并推动了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并且，正如全世界今天看到的那样，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如果我说，我爱这个国家，那绝不是夸大其词。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建设及其出色的人民贡献我个人的微薄力量。不管是作为中国专业力量的训练者，还是早些时候作为德国企业派驻现代中国的代表，作为咨询顾问或者作为资助金的募集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对我们德国也是重要国家的福祉。我确信——这也是我在和杨得志谈话中经常感受到的一点——德国人和中国人可以相互进行很多很多的交流。鉴于21世纪初围绕宗教和原料问题发生的冲突，以及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这种交流对德国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当然，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不要自己骗自己：有关各方都是为了生意。但除此之外，还有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不能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货币可以表现出来的价值，即信任和人情。这两样东西是我“迄今人生总结中的重要资产”。谈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中国女孩王敏（音）和男孩杨建军（音）。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我去了他们的家乡铜川，那是从西安往北大约90公里左右的一个偏僻山村。我们承诺为孩子们提供帮助，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资助了他们。现在，听说这两个孩子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大学学业。当时建立的帮扶关系现在依然存在，好几个儿童因此而得到了资助。

我深信，如果我的朋友杨得志得知这些情况，他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

目 录

第一章 影响一生的奇遇：同中国人在瑞士伯尔尼相识·····	1
第二章 胸怀故乡，志在四方。为了立足于世界，必须稳定内心·····	7
第三章 老问题，新办法：改善大众食品的十点建议·····	13
第四章 慈父般的朋友：总参谋长杨得志同志（1910—1994）·····	17
第五章 中国朋友——德国朋友：“真情无价”·····	27
第六章 在中国（Ⅰ）：为德国克虏伯朗罗有限公司当顾问·····	37
第七章 在中国（Ⅱ）：帮助者和发现者，培训者和推动者·····	51
第八章 在中国（Ⅲ）：在哀牢山寻找沉睡的丰富宝藏·····	69
第九章 楷模之国：中国人在多纳斯贝格·····	77
第十章 令人瞩目的地方：在广袤国土上的长途旅行·····	81
第十一章 一切都只是梦？一种素昧生平的文化如何激活了我的感官··	101
第十二章 给科尔总理做中国式的猪肚子：在政治家、 军人、外交官中间·····	105



第十三章	西藏——走向天、地、水、火、风的旅行·····	115
第十四章	总结：中国人和德国人能相互学习些什么·····	135
第十五章	与中国政治家、外交官、军人、 干部和管理人员会见的记录·····	139
后 序	·····	153

第一章

影响一生的奇遇：同中国人在瑞士伯尔尼相识

1981年7月21日是星期二，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日子。天气阴沉了一个上午之后，太阳终于拨开云层渐渐出现。伯尔尼高地的上空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几片零星的浮云。我和我的妻子海德龙正在去瑞士的路上，去度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的小假期。对于一对已有三个孩子并以手艺为生的夫妇来说，这样的旅行是再美不过的了。我们的目的地是瑞士雪朗峰，距海平面2790米。这是詹姆士·邦德电影系列《奉皇帝陛下之命》的故事发生地。我们乘登山轨道火车直奔顶峰。作为奖励，山顶上等待我们的是一幅宏伟壮观的美景。“Piz Gloria”（餐厅名，译注）是山顶上的一家旋转餐厅，那天下午生意兴隆。每位用餐的客人一落座就有服务员送上一杯香槟，这对瑞士的风俗习惯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没有多久，女服务员又过来送上第二杯。我们禁不住发问，“今天我们为何如此荣幸？”这位女服务员回答说：“因为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刚刚到访”。顷刻之间，我们注意到隔壁长桌上整整一排坐着大约20来个中国人和几个欧洲人。开始时我们对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到访没有太注意。直到一架放在窗台边上的摄影机出现在我的眼皮底下时，我才意识到周围这一切。“这是谁的摄影机？”很快，一个中国人疾步过来，非常礼貌地向我们表示歉意和感谢。对我们来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坐在来自遥远国度且陌生的中国客人旁边，实在是一次难得的经历。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一生中直到那一天为止亲眼看到的第一批中国人！

隔壁桌子上谈论的话题始终不离政治。两个东道主中有一个谈到，瑞士虽然是个很小的国家，却是西欧国家民主政治的中流砥柱，她保证了民众的自由和富裕。这话叫人听了

气恼。恰恰是这个瑞士，它实际上不愿意和欧洲有太多的关系！我被激怒了，突然我吃惊地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还带着一点儿Dole de Wallis（瑞士红酒）的酒意：“在欧洲，保证民众自由和富裕的首先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如果德国不能做到这一点，瑞士也无法顶住来自东方的压力。”现场的译员为了反映全面情况，马上把我的插话也同时翻译了过去。在场的中国人热烈地鼓起了掌，而那位东道主却不知所措，他问：“您来自瑞士哪一个州？”我回答说：“我们来自‘普法尔茨’州！”“那您是德国人啰？”“那当然，普法尔茨是出名人的地方，我们的下一任联邦总理也将来自普法尔茨。”



伯尔尼高地的雪朗峰

中国人对我的简短插话以及我同这位瑞士东道主的对话产生了好奇。瞬间，两位翻译走到我们桌边，问我们是否愿意坐到他们那一桌，他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我。我的妻子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下可有点害怕了：“这下你可捅娄子了，要被抓起来了！”人们让我们坐在一个年纪稍大并穿着军装的中国人对面。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军衔等级的标识，因此我也不可能意识到坐在我面前的究竟是谁。不过，谜团很快就被解开了，因为

接下来人们给我介绍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杨得志。

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我从那以后的生活。

杨得志友好地笑着问我是不是摔跤运动员或者是其他种类的运动员？这位将军当时这样问我一定是暗示我那有点魁梧的体魄。我告诉他，我是西德普法尔茨地区的一个手工业者。他问我是否也不害怕“在一个别的国家如此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回答他说：

“我是一名肉制品加工业的工人，我不惧怕任何事情，但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承受真话的能力。”话虽然这么说，当时的情况使我确实感觉有点不自在，因为随便掺和别人的谈话不是我的为人风格。但当时那个瑞士人的高谈阔论确实使我无法忍住不予反驳。

谈话就这样展开了。这位将军想知道，我对中国都知道些什么。那个时候，我对中国确实了解不多，无非就是小学里读到的一些书本知识：中国长城、京杭大运河、紫禁城、蒙古人、马可·波罗。还有无法想象不计其数的中国人。但这一时刻我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是，对如此一个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和古老传统的伟大民族竟长期处于被孤立状态感到遗憾。我继续解释道，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从中国获益匪浅。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耳边回荡起坊间师父的声音：中国的家庭和小作坊主长久以来用以制造一流商品的灵巧手艺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不论是丝绸还是瓷器，地毯还是造纸，中国产品几千年来就在世界各地热销。坐在我对面的谈话伙伴们惊讶了。我如此坦率地侃侃而谈，是他们未曾料到的，包括这位将军也没有。“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对外开放呢？”我向杨得志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如果这样做了，外界关于中国“自我孤立和躲在竹幕后面”的宣传就会不攻自破。我向我的谈话伙伴提建议说，“你们可以多关注一下西德”，“中国如果不尽快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那么，恐怕还要等上很长时间才能取得进步。”

我的印象是这位总参谋长听了我的话相当惊讶，但尽量表现得不露声色。他的随行人员也都很守纪律。完全不像东道主和他们驻北京的大使凯勒。对他们来说，这场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超过一个小时的意见交换，意味着彻底打乱了原先的日程。

我们继续这一天的假期活动。僧侣峰、艾格峰和少女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壮丽的雪山图景。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给孩子们购买了礼物。接着，又是巧合，过了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遇上了这群中国人。他们站在缆车那儿准备前往施特歇尔贝格缆车站。杨得志友好地向我们挥手致意，第二次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再次聊了几句。直到施特歇尔贝格山谷车站，我们一路上继续我们的“峰会”。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改善经济状况、大众食品以及如何加强培训和激发群众的个人积极性，等等。这次谈话，杨

得志同样听得非常认真。我想这段对话一定被记录了下来。不管怎样，这位总参谋长当场邀请我去北京。“邀请我去北京？”这在那个年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稍作思考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一位身份非同寻常的人——虽然我当时不懂得中国总参谋长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位。我感觉被这个老人吸引住了，看上去他大概可以当我的父亲了。告别的时候，我们互相保证“保持联系”。刚走了几步路，瑞士驻华大使凯勒从后面追上来，向我要了地址。他告诉我，今天我们“赢得了朋友”，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一切都是从雪朗峰开始的：同杨得志总参谋长的第一次会面。



嘉斯拍摄的中国代表团杨得志总参谋长和嘉斯夫人海德龙在雪朗峰上

那一天，就是1981年7月21日这一天，我们差点儿第三次碰上了杨得志将军和他的代表团：在我们向瀑布镇方向走的时候，一辆由瑞士警察摩托车队护送的大面包车赶上了我们并且停了下来。又是那个中国代表团。他们建议我们上车同行，但我们礼貌地表示感谢，说：“今天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我们得先消化一下。再则，我们实在不该再继续耽误你们代表团的行程啦！”中国人接受了我们的推辞，并且一直向我们挥手示意再见，直到他们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第二天，该回莱茵普法尔茨老家了。然而，脑子里却怎么也转不到回家这个思路上来。因为刚刚经历过的一切实在太令人印象深刻了，以至于我总是不停地想这件事。我没有考虑如果一个瑞士人在德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掺和同政府客人的谈话并且因此而打乱整个议程，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我彻夜无法入睡。脑子里不停地重复：中国！中国！中国的朋友？总参谋长杨得志是何许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的话可是当真的？他让我去中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吧？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唱过：“曾经在上海！”唱这支歌的时候，我们知道上海在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可以肯定，那天晚上在瑞士布里恩茨湖畔尼德里德的 Zum Becher 酒店，我度过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激动不安的一夜。第二天用早餐的时候，我向酒店询问，昨天这里附近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团来过。回答是“不太可能吧”，要不然大家都会知道。我随手拿起一份当天的日报，看到伯尔尼联邦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为首的代表团在其短暂访问瑞士期间参观了雪朗峰”，还附上一张我昨天那位谈话伙伴的照片以及昨天那位讲话者的名字，还有凯勒大使和雪朗峰轨道公司总经理恩斯特·福伊茨。

又回到了多纳斯贝格。四个星期之后，我们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有一天我偶然从广播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参谋长杨得志打算为他的士兵们引进勋章。我终于第一次在我国又听到了他的名字。中国的勋章？还有我那个谈话伙伴的名字。这难道不是再次和他联系的大好机会？于是我打了一个小包裹，里边放了我们家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还附上一封信：“尊敬的杨得志总参谋长：您还记得我吗？还记得我们在雪朗峰的谈话吗？昨天我从广播里听到，您准备为您的士兵引进勋章。我觉得您的想法很好，这样做会大大提高战士们的积极性。随信寄去几枚勋章，它们是我们祖父和叔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我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也许这可以给你们制作新的勋章带来一点启示”。“收件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参谋长杨得志先生”。邮费花了10.80德国马克。邮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能确保信件和包裹能准确送到。我也是这么想的。

又过了几个星期。期间我设法弄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资料，并且阅读了所有我能得到的与这个话题相关的材料。10月底，我的妻子从我们制作香肠的作坊里传出声音，要我赶紧去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怪怪的，说要和你通话。”确实是一个陌生、不熟悉的声音：“这里是波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我们收到了总参谋长杨得志先生给您的一封信和一份礼物。我们想请您和您的家人来使馆作客。”这个电话，我真的怎么也没有料到。我本能地回答说：“您来过普法尔茨吗？我邀请您、您的夫人以及陪同人员到我们丹内费尔斯来。”



第一批中国客人来访：孙丕荣武官和夫人在丹内费尔斯受到我们热烈欢迎。

1981年11月14日那天，丹内费尔斯第一次迎来了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到访：国防武官孙丕荣携夫人和副手兼翻译祝嘉淳先生。祝嘉淳先生后来成了他的继任者，中国驻波恩的国防武官。我们带他们参观了哈姆巴赫宫、葡萄酒之路，去了戴德斯海姆以及巴德迪克海姆，在那里参观了大酒桶，最后又回到了多纳斯贝格。在我们家里，我们让他们品尝了普法尔茨地区的特色菜肴。谈话中，我们一再重温在瑞士的经历，以及我们想去中国做点事的考虑。借此机会，我从孙丕荣那里了解到杨得志在中国的地位：他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即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四名委员之一。这四人：邓小平、杨尚昆、张爱萍和杨得志。